

知识分子与政权：俄国大革命期间的文艺界

杨 正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京 210023）

提 要：国家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历来都是人类面临的最尖锐问题之一，其中知识分子和政权的关系通常又表现得最为复杂和紧张。在即将迎来俄国大革命 100 周年的今天，对该问题的研究仍不失其现实性。20 世纪初置身于俄国大革命旋涡中的文艺界知识分子走过了一段复杂的心路历程。他们对革命满怀希望又最终失望，在对待新政权态度问题上内部产生了分化，有过合作，有过妥协，也有过抗争。最终，在政府高压下知识分子与政权关系总体失衡，知识分子要么被政权镇压，要么被迫集体从苏俄出走，要么主动或被动转型，从而也宣告俄罗斯白银时代的终结。

关键词：俄国大革命；文艺界；知识分子；政权；白银时代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一个世纪前，危机四伏的俄罗斯帝国接连爆发了两次革命，史称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近些年俄罗斯史学界开始倾向于将 1917 年的这两次革命以及此后的国内战争按照法国大革命的提法统称为俄国大革命（1917—1921）。如今，该提法已为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所沿用。比如，俄罗斯教育出版社和德罗发出版社 2016 年发行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新课标）¹里均采用了这种表述，将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视为俄国大革命的两个阶段。就这种提法本身来说并不新鲜。最初，二月革命就被称为俄国大革命，例如李大钊 1917 年 3 月就在报刊上发表过一篇名为《俄国大革命之影响》（李大钊 2006：21）的论文。这一提法的再次出现与流行，实际上是国家意志力作用的结果。这表明，在普京新历史主义观的指导下当代俄罗斯史学界在对待苏联早期历史问题时逐步趋于一致。

俄国大革命对于俄国来说具有分水岭意义。可以说，革命前后的俄国“判若两国”。革命后首次出现了大规模的移民浪潮，数以百万计的俄罗斯人主动或被迫离开俄国，流亡到西方。而这其中绝大部分又都是精英阶层的知识分子。因此，俄国侨民潮带走的不仅是本国的智力资源，也包括一大部分俄罗斯传统文化。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俄国侨民作家罗曼·古尔写道：“我们不是离开了俄罗斯，而是将俄罗斯随身带走了”（Л.Г. Березовая 2001：121）。这就不难理解，为何俄国侨民知识分子中有许多人将保存俄语、俄国文化、东正教信仰以及俄罗斯传统视为自身使命。俄国侨民浪潮的另一后果就是原来统一的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化（突出表现为文学）进程从此分裂成空间上彼此隔断的两支：本土文化与侨民文化。

国家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历来都是人类面临的最尖锐问题之一，其中知识分子和政权的关系通常又表现得最为复杂和紧张。在即将迎来俄国大革命 100 周年的今天，对该问题的研究仍不失其现实性。那么，深处大革命浪潮之中的俄国文艺界知识分子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心路

历程？他们的最终命运又是如何？接下来，我们就从知识分子与政权关系的角度来考察大革命时期俄国文艺界的基本状况。

2 二月革命——希望与失望

早在 1915 年，俄国就有知识分子敏锐地预感到革命风暴即将来袭。前线军队的溃败和严重的社会动荡是革命前的征兆。诗人弗·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在回忆录中写下这样富有预见性的句子：“随着 1916 年越来越临近，我愈发清晰地感受到空气中扑面而来的气息，它似乎预示着某些史无前例的重大事件即将发生。”（В.А. Рождественский 1962: 183）诗人勃洛克在诗中写道：“一大早就连打开报纸都觉得可怕”（А.А. Блок 1932: 338）。到了 1917 年初，这种恐惧的感觉进一步加剧了。画家米·涅斯特罗夫后来回忆起来仍心有余悸：“战争和流血仍在继续。国内的气氛变得越来越黑暗和紧张。连空气也变得沉闷起来。雷雨，风暴，革命——可怕的灾难泰山压顶般袭来。”（М.В. Нестеров 1917）

即便如此，二月革命的爆发是极其突然的，由于其自发性和无组织性，后来甚至被一些研究者称为“没有革命家的革命”²。1917 年 1 月 22 日（革命爆发前一个月），列宁在瑞士做了一场关于 1905 年革命的报告，报告结尾他还悲观地预测：“我们这些老年人，也许看不到未来这次革命的决战。但是我认为，我能够满怀信心地表示这样的希望，那就是现在正在瑞士和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出色地工作着的青年们，会有幸在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中不仅参加斗争，而且取得胜利。”（列宁 1990: 333）俄国知识分子的日记中我们也很难找到对二月事件的详细描述。一向被誉为“革命预言者”的女诗人吉皮乌斯在 2 月 23 日的日记中只是提到由于面包紧缺而引起了混乱，但她看不到其中“任何有组织的迹象”，并由此认为这“只不过是一场普通的饥民小暴动”（З.Н. Гиппиус 2003: 206）。直到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后，俄国文艺界才意识到革命的到来，大多数人都为之一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别努阿、库斯托季耶夫等人兴奋地把二月革命称作伟大事件。列宾在信中欣喜地写道：“这是我们生活中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啊！幸福地令人难以置信。”（И.Е. Репин 1950: 198）一些诗人为二月革命热情献诗。巴尔蒙特就专门创作了一首标题十分醒目的赞诗《自由的国度俄罗斯万岁！》。布留索夫也完成了他的诗歌《在三月的日子里》以示对革命的支持。吉皮乌斯称这些日子为“自由的伊始”，认为二月革命的最初几天就像“恋爱般纯洁”（З.Н. Гиппиус 2005: 10）。叶赛宁、克柳耶夫等新农民诗人³兴奋地宣告“我们的时代来临了！”（А. Козловский 1986: 329）3 月刚返回彼得格勒的诗人勃洛克把二月革命视作“伟大的民主”（А.А. Блок 1963: 479），它结束了俄罗斯黑暗过去，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布宁在 1917 年 4 月 17 日的日记中写道：“旧的腐朽的制度彻底覆灭了。在自发的、火热的激情中腐朽的罗曼诺夫王朝宝座被人民永远推翻了。”（А.Афанасьев 1990: 65）可见，俄国文艺界在二月革命后总体表现出积极乐观的心理。这与知识分子天生追求自由的精神分不开，他们为沙皇专制制度的倒台欢呼，对革命可能带来的民主和自由充满期待。

俄国未来派诗人们渴望革命后会出现一个新的社会，而随之也定会诞生新的艺术。因此，他们积极支持革命。这并非为了谋求政治利益，而是源自诗人们的美学追求。对于未来派来说，艺术的生命力在于改造世界。而改造世界仅从艺术手段的创新开始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借助革命摧枯拉朽的力量。因此不难理解，一些未来派诗人甚至亲自投身到政治运动和革命实践中去。比如马雅科夫斯基等人非常热衷于进行革命宣传。

此外，俄国文艺界部分知识分子对革命的态度较为谨慎，有时表现出错综复杂的矛盾心情。画家库斯托季耶夫在 3 月份写给好友卢日斯基的一封信中用“既可怕又兴奋”（В.П. Лапшин 1983: 70）来表达这段时间内心的复杂感受。另一位画家涅斯特罗夫感觉自己度过了一段“极度心慌意乱”（В.П. Лапшин 1983: 70）的时期。面对革命中的暴力，许多知识分子表现出担忧。梅耶荷德希望：“这不仅仅是在破坏，而是破坏的同时也在建设。”（В.П.

Лапшин 1983: 10) 路标派知识分子虽然大多也肯定二月革命的意义(如: 司徒卢威说二月事件是一次“燃烧、净化和启蒙”(Русская свобода 1917: 3) 别尔嘉耶夫称俄罗斯人民“痛快淋漓、极其完美地”完成了一次“短暂的、没有流血, 没有痛苦的革命”(Русская свобода 1917: 6)。但他们也预感到革命中的无政府状态和社会严重分裂的潜在危险, 看到了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 因此对革命的前景并不十分乐观。

当然, 也有少数知识分子对二月革命的爆发漠不关心甚至持否定态度。其中以诗人沃罗申最为典型。他说自己对“二月政变”没有太大的热情, 认为它不能称为革命, 而只不过是一场“士兵暴动”(М.А. Волошин 2008: 424), 担心接下来会有更多惨剧发生。他甚至否定俄国历史上的历次革命, 认为一切革命都是“野蛮大众的歇斯底里般的抽筋”(М.А. Волошин 2004: 56), 而俄国革命则是一种“宗教神经病”(М.А. Волошин 2008: 486)。

面对革命浪潮, 文艺界许多人都在思考知识分子应当在革命中扮演何种角色。1917 年秋, 诗人巴尔蒙特《我是不是革命者?》一书问世。他认为, 如果革命者是创新者, 那么作为艺术领域创新者的诗人也应当是革命者。勃洛克在 1918 年发表的《知识分子与革命》一文中呼吁知识分子应当“全神贯注地”倾听革命, “全部身心”地发挥自己的知识和才智来帮助革命群众。他又说, 知识分子不仅可以与布尔什维克一起工作, 而且他们应当这样做。1919 年 1 月 7 日的日记中他写下了这样的话: “生活是多么的充实(已经达到了可能的最大化): 1917 年的我, 沿着革命的道路前行, 这是一条正路。”(А.А. Блок 1962: 257) 革命后最初的日子里, 知识分子对人民群众是抱有同情心的, 并且能够容忍甚至为他们的许多过激行为开脱, 认为那是情有可原的。针对俄国农村出现的焚烧地主庄园等暴行, 勃洛克这样解释: “为什么他们要破坏古老的教堂? 因为一百年前肥胖的牧师在这里一边打着嗝, 一边从事收受贿赂、贩卖伏特加的勾当。为什么他们要焚毁地主的庄园? 因为这里曾是侮辱和鞭挞姑娘们的地方——不是这家地主, 便是别家地主。为什么捣毁上百年的花园? 因为一百年前在花园茂密成荫的槭树和椴树下地主老爷们大耍着淫威: 指着穷人的鼻子骂他们是穷光蛋, 指着下人的鼻子骂他们缺乏教养。”(А.А. Блок 1963: 15)

20 世纪初的俄国党派林立, 然而党员中知识分子的人数却很少。知识分子中的大部分人是远离政治的, 而且对各党派主张的认知也是有限的。在他们看来, 每种主张都有其合理性。勃洛克就这样写道: “所有人都是对的。立宪民主派是对的, 高尔基的主张是对的, 布尔什维主义里也蕴藏着可怕的真理。我什么也看不清, 虽然我从未丧失过乐观。”(А.А. Блок 1963: 495—496) 诗人将高尔基与其它党派并列, 表现出他对政党政治的理解是较为笼统和模糊的。这段时期, 教育大众作为服务革命群众的一种手段几乎成为各类知识分子间的唯一共识。各政党的报纸(从立宪民主党的《话语》报到布尔什维克的《斗争》报)都在呼吁知识分子“到民间去!”

二月革命后, 俄国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即临时政府和彼得格勒苏维埃。知识分子对待这两个政权的态度呈现出差异性和变化性特点。起初, 知识分子大体上是支持临时政府的, 认为它是能够使俄国摆脱危机和未来民主变革的主要力量。临时政府的领导人科伦斯基在知识分子的心目中更是成了“宠儿”、“革命英雄”。他们几乎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此人身上。罗赞诺夫 1917 年夏称赞道: “他很帅。四处奔波, 发表演说, 但从不开枪”(В.В. Розанов 1992: 357)。卢那察尔斯基对科伦斯基的一次演说有这样的描写: “周围一片欢呼。他的嗓音短促而嘶哑, 但对演讲的内容得心应手, 饱含真诚, 并伴随着优雅的停顿。”(Н.С. Антонова, Л.А. Роговая 2005: 196—197) 吉皮乌斯在日记中回忆道: “我们爱过科伦斯基。他身上有着某种活力和冲劲, 也有些孩子气。尽管他有些神经过敏, 但那时我们觉得他比许多人都要更有远见, 更加清醒。”(З.Н. Гиппиус 2005: 9) 后来由于临时政府迟迟不拿出解决社会迫切问题(主要是战争和土地问题)的具体方案, 知识分子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尤其是 1917 年 4 月 18 日临时政府外交部长帕·米留可夫致各盟国政府的照会发布后, 知识分

子对革命后的俄国是否应当继续世界大战的看法产生了分歧。大部分知识分子支持政府继续前线战事直至胜利。司徒卢威、别尔嘉耶夫等人就呼吁实现“战争直到最终胜利”这样的口号。作家安德烈耶夫认为革命不仅仅是大战爆发的结果，而且应当通过战争来巩固革命的成果。他解释道：“自由只在我们身上实现还远远不够，我们希望自由能在全世界取得胜利。让自由征服全世界。”（Л.Н. Андреев 1994：365）画家别努阿甚至提出“为了避免国内屠杀，应当在海外战场进行百万人大屠杀”（А.Н. Бенуа 1917：3）。看得出，俄罗斯民族性格中拯救世界的弥赛亚意识在俄国知识分子身上根深蒂固。而持反战立场的知识分子则只占到少数。比如沃罗申反对一切战争与革命。吉皮乌斯称那些支持将战争进行到底的人为“好战分子”，并认为这是一种“毫无意义的爱国主义”（З.Н. Гиппиус 2003：156）。她预言性地指出：“有一点是清楚的，即战争对目前的俄国政局来说不会有什么好下场”（З.Н. Гиппиус 2005：8）。

相比之下，文艺界对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态度一开始褒少贬多。吉皮乌斯对它没有好感，称它为“两千乌合之众，制造无休止的集会和骚乱的夺权者”（Гиппиус 2003：232）。彼得格勒苏维埃里的知识分子代表数量很少。这实际上表明知识分子和工农阶层之间在政治诉求上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但在亲眼目睹人民群众的自发力量之后，部分知识分子的言行开始表现出矛盾性。斯坦科维奇揭露，他们“热烈庆祝和赞扬革命，对维护自由的士兵们喊着‘乌拉’，并佩戴红色领结。但他们的内心在蜷缩着，抽搐着，觉得自己被一种敌对的、不知走向何处的自发力量所俘获”（В.Б. Станкевич 1926：33）。

总之，二月革命爆发后的几个月俄国文艺界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是在不断变化的。由于临时政府危机处理措施不得力，因此革命最终未能实现知识分子原先的希望。俄国文艺界对于二月革命的看法，哲学家乌斯特里亚洛夫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在纪念革命8周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二月革命只能成为序曲或尾声。它没有实质性的内容。它或是表明结束、毁灭和死亡，或是雷雨时划过天际的闪电的余光。又或许两者都是。”（Н.В. Устрялов 2003：183）于是更多的人开始希望保持中立，专心从事创作。正如梅耶荷德所希望的那样，在自己的创作中留下“混乱时代的印记”（В.П. Лапшин 1983：10）。

3 十月革命——转型与出走

俄国文艺界在对待十月革命的问题出现了泾渭分明的两种态度，根据各自政治立场的不同，有些人公开反对，有些人明确支持。有时双方的观点构成了“不在场”的辩论。例如：吉皮乌斯强烈谴责革命中发生的种种暴行。据她回忆，革命军队“在抢劫和破坏，他们砸开库房大门，抢走了金银财宝。凡是拿不走的東西就地销毁：珍贵的瓷器被摔碎，地毯被割裂，谢罗夫创作的肖像画被撕破和戳穿。最终他们来到了酒窖……一队受伤的女兵被强行押送到巴甫洛夫斯克军营，悉数受到凌辱。”（З.Н. Гиппиус 2003：323）诗人库兹明在一次谈话中则公开表示：“当然，我是布尔什维克。我承认，比起那些只会空喊保卫祖国口号的自由派，我更喜欢列宁。在20世纪，战争是件很可怕且令人讨厌的事。”（Н.А. Богомолов 1998：203）吉皮乌斯痛苦地说道：“我的俄罗斯完了”。她在1922年于柏林出版的《1911—1921年日记》一书中将二月革命那章的标题定为“革命”，而十月革命那章的标题是“死亡”。勃洛克的观点则恰好与她相反。1918年1月他在一次公开讲话时说：“我听到有人在喊‘俄罗斯要死了’，‘它再也没有了’，‘永远怀念俄罗斯’等。但我面前的俄罗斯仍然是那个令伟大作家们魂牵梦绕的俄罗斯，彼得堡仍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看到的那个彼得堡，俄罗斯也仍然是果戈里称之为飞驰的三套车的那个俄罗斯……俄罗斯注定要经历这些苦难和分裂，但它一定会摆脱这些屈辱，再次复兴成为强国。”（А.А. Блок 1963：15）

未来派诗人对十月革命有很大的热情。他们渴望通过革命来实现其美学理想。马雅科夫斯基高呼这是“我的革命”（В.А. Катанян 1956：96）。在未来派眼中十月革命首先是进行“美

学革命”的先决条件。马雅科夫斯基就被文艺青年们誉为“新艺术和革命艺术的斗士”。然而，他们主张要与过去的文化传统决裂，充分显示出其思想中的极端性。未来派在他们著名的宣言《给社会趣味一记耳光》中，甚至提出要“把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等，从现代生活的轮船上扔出去”（中国社科院外文所 1998：111）。正是这种极端性使得他们最终与布尔什维克政权分道扬镳。马雅科夫斯基以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当然，知识分子对十月革命及新生苏维埃政权的态度更多时候表现出复杂性，并非只有拒绝或者接受那么简单绝对。比如，被苏联官方视为革命的海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奠基人高尔基也写过批评革命中过激行为的《不合时宜的思想》，诗人勃洛克既创作过赞扬革命的长诗《十二个》，也在杂志上发表过对革命有着不同看法的论文《人道主义的崩塌》。农民出身的叶赛宁始终站在革命的一边，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带着农民的倾向以自己的方式接受的这一切”（С.А. Есенин 2006：20）。还有一些人，比如沃罗申，虽然不接受十月革命，但出于对俄罗斯的爱，甚至在内战爆发时也不愿离开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权开始设立一些组织机构以吸纳知识分子进入工作。1917年11月9日通过了关于成立国家教育委员会的法令，并订于11月18日在冬宫召开会议以商讨委员会中知识分子代表问题，会议邀请了那些愿意致力于艺术服务大众事业的文艺界人士。但最终到场的只有5人。这表明知识分子对新生政权尚心存芥蒂。在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面前，部分知识分子变得惊慌失措。戏剧家聂米罗维奇-丹钦科坦诚：“说实话，革命爆发的时候，我们感到了害怕。”（В.И. Немирович-Данченко 1952：147）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知识分子与苏维埃政权的关系中也表现某种对抗性，其中反抗态度最激烈的以旧知识分子群体为主。几乎与布尔什维克颁布《出版法令》同时，1917年11月26日一群知识分子发行《俄国作家协会抗议报》以示对苏维埃政府法令的抗议。文章作者当中有扎米亚京、吉皮乌斯、梅列日科夫斯基、索洛古勃等，他们批评法令严重干涉了创作自由。同时，他们开始对布尔什维主义展开研究。在1918年完成的《来自深处》文集中作者们延续了路标派知识分子历史反思的传统，他们试图找到战胜布尔什维克的方法。宗教哲学家阿斯科尔多夫认为，俄国人民之所以支持布尔什维克只是因为他们许诺给人民土地并结束战争，而与社会主义思想本身无甚关联。司徒卢威简短地总结道：“俄国革命是一次国家破产和世界性耻辱。这就是自1917年二月事件以来不容置疑的政治结局。”（Вехи 1991：459）他还指责布尔什维克宣扬的阶级斗争理论在农民的心理架构上容易被等同于人身消灭，因而实际上造成了一种不加甄别的滥杀无辜。内战期间，许多旧派知识分子转而与邓尼金的解放社合作，从事反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宣传或是加入白军作战。1921年11月27日布宁在巴黎俄侨创办的《共同事业报》上发表一篇札记，文中呼吁“以上帝和人类的名义……打倒蛊惑人心者”（И.А. Бунин 2006：300）（此处暗指布尔什维克）。

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就有多家剧院罢演以示抗议。如彼得格勒的亚历山大剧院。而米哈伊洛夫剧院则在1917年11月份上演了一出名为《立宪会议颂》的戏剧。这实际上是在借歌颂立宪会议之名来表明他们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立场。1918年初当立宪会议被强行解散后，又有35人退出该剧院。为此，卢那察尔斯基将剧院的领导解职。当然，戏剧界中也有接受新政权的知识分子代表。著名歌唱家夏里亚宾在马林斯基剧院的罢演行动中率先退出，面对同事的指责，他回答道：“有什么办法呢？我需要音乐。”（И.И. Манухин 1958：109）应当说，夏里亚宾的回答其实很具代表性，许多知识分子在艺术与政治之间最终还是选择了艺术为重，政治中立的立场。因此，苏维埃文艺就在这样一种矛盾对抗中逐步发展。1918年11月7日马雅科夫斯基的《宗教滑稽剧》在俄罗斯联盟第一剧院上演，这是一部反映革命斗争的社会生活剧，具有较高的思想艺术水平，它标志着苏维埃戏剧的诞生。该剧由梅耶荷德导演，舞台布景和服装由马列维奇负责完成。这部戏剧首次清晰地展示了作为支持十月革命的时代政治剧作应当遵守的主要原则，因此具有很强的宣传性和代表性。《宗教滑稽剧》对经

院派艺术进行了冷嘲热讽，序幕的结尾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在所有观众的注视下挂在帷幕上的老式剧院海报被扯得粉碎。

总体上，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文艺界知识分子们大多在努力适应新的现实，寻求与新政权合作的可能途径。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知识分子（尤其是旧知识分子群体）在与布尔什维克政权的相互关系中始终无法达到双方期待的程度。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虽然不少文艺界的知识分子是爱国人士，但他们也未能立刻转变成红色信仰。”（М.П. Ким 1985：342）

动乱的年代加上与新政权的不和，“身处重大社会转折和自身转型时期的苏联知识分子未能获得与其知识水平和工作贡献相应的地位，普遍处于政治和社会地位低下和经济状况欠佳的境地”（张建华 2010：124）。生计问题成了现实威胁，许多人面临着要么挨饿，要么“放下笔去扫大街”的残酷选择。作家霍达谢维奇在日记中写道：“我们正在经历粮食配给时期。科学工作者们都分到了配额，而作家只给了 25 份。”（В.Ф. Ходасевич 1997：321）女作家妮·别尔别洛娃回忆道：“1919—1920 年冬天情况变得异常糟糕。我们是在没有暖气的半地下室度过的。唯一取暖的途径就是依靠那扇通往厨房的窗户。3 个人挤在一间小屋里，屋内的温度只有 5 度（就在那个时期已算是奢侈了）。我们只能靠菜汤、非法弄来的小麦粥（有时加点黄油）、马合烟、糖精和茶勉强度日。”（Н.Н. Берберова 1998：278）为尽力改善知识分子们如此窘迫的生存状况，高尔基数次给列宁写信呼吁政府施以援手。1918 年底高尔基成立了文学之家和艺术之家，此举不仅旨在繁荣艺术生活，也是为了能在生活上给予文艺工作者们力所能及的帮助。高尔基的这一举措可以说功德无量。许多人后来回忆起都心存感激。作家费定在回忆录中就提到，文学之家成了“作家们第一个集体避难所”（К.А. Федин 1961：63）。勃洛克认为是命运让高尔基成为“人民和知识分子的中间人”（А.А. Блок 1962：92）。高尔基还组建了世界文学出版社，吸收了不少文艺工作者参与工作。他呼吁知识分子认清自身立场，在《致人民与劳动知识分子的一封信》中他写道：“智力劳动者们应当明确，他选择跟以下哪一类人走得更近：旧的、腐朽的、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政权维护者，还是那些新社会思想和情绪的缔造者以及将所有美好愿望都付诸实施的人？”（М. Горький 1953：189）

然而，高尔基的努力亦无法消弭知识分子与政权之间的隔阂以及知识分子内部的分歧。革命后，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布尔什维克加大了强制性改造的力度。政府开始使用一些非常手段对知识分子施压，比如搜查、没收生活资料、强制迁出住所和逮捕。画家亚·罗德琴科在 1918 年 12 月 1 日的日记中写道：“这些天我都在四处找房子，因为我被逐出了家门。这种永无休止的忙碌和觅食实在是受够了”（А.М. Родченко 1996：78）。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要幸运一些，但若不是卢那察尔斯基亲自介入，他也将被迫从自己的住所中迁出。最终，在政府的高压下知识分子与政权关系总体失衡，知识分子要么被政权镇压，要么被迫离开苏俄，要么主动或被动转型。

4 代结语

20 世纪初的俄国社会动荡不安，先后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大革命。然而，就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折时期俄国却迎来了文化艺术的白银时代（也有人把这段时期称为俄国的“文艺复兴”）。处于俄国大革命旋涡中的文艺界知识分子走过了一段复杂的心路历程。他们对革命满怀希望又最终失望，在对待新政权态度问题上内部产生了分化，有过合作，有过妥协，也有过抗争。在生活状况的持续恶化以及国家政权的强制性改造的重重压力下，知识分子自身被迫转型或是集体出走。

同时，处于大革命时期的俄国知识分子对自身命运进行了深刻的思索。1920—1921 年俄罗斯文艺界发起了一场名为“俄罗斯文学有没有未来？”的大辩论。诗人曼德尔施塔姆在《词与文化》一文中断言：“文化成了宗教”。而作为宗教的文化与国家脱离，世俗生活不再和知识分子相关，“我们吃的不是食物，而是斋饭；睡得不是房间，而是修道室；穿的不是

衣服，而是僧衣。最终，我们获得了内心的自由和真正的愉悦。”（О.Э. Мандельштам 1993: 212）但后来的事实表明，诗人的论断只不过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美好愿望。知识分子的命运并不能完全由他们自己掌握。1921年女诗人阿赫玛托娃的丈夫古米廖夫以反革命罪被枪决；同年，勃洛克在多次申请出国治疗未果后不久病逝（张建华 2010: 123）；1922年苏联政府大规模驱逐知识分子的哲学船事件⁴。这些事件都标志着俄罗斯白银时代在俄国本土的终结，而《词与文化》一文也成了时代终结的一篇祭文。

附注

1 比如：Волобуев О.В., Карпачёв С.П., Романов П.Н.,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начало XX - начало XXI века. 10 класс[M], Москва: Дрофа, 2016.; Горинов М.М., Данилов А.А., Моруков М.Ю.,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часть 1). 10 класс[M], Москва: Просвещение, 2016.

2 比如：Катков Г.М., Феврал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M]. М.: Русский путь, 1997, С. 262, 283; Старцев В.И., Русская буржуазия и самодержавие в 1905-1917 гг. [M]. Ленинград: Наука, 1977, С. 124-128; Семенов Е.П., Февральские и мартовские дни 1917 г.[J].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 1917, Т. 147, № 3, С. 6-7.

3 新农民诗歌是俄罗斯白银时代一个重要的诗歌流派，主要代表诗人有：叶赛宁、克柳耶夫、克雷奇科夫等。

4 详见：别尔嘉耶夫. 伍宇星编译. 哲学船事件[M].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版。

参考文献

- [1] Андреев Л.Н. S.O.S. [M]. Москва: Atheneum; Феникс, 1994.
- [2] Бенуа А.Н. Почему мы воюем? [N]. Новая Жизнь, Пг., 23 апреля 1917(5).
- [3] Берберова Н.Н. Курсив мой. Автобиография[M]. Москва: Согласие, 1998.
- [4] Березовая Л.Г. Культура русской эмиграции (1920 — 30-е гг.) [J]. Новый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 2001 (5).
- [5] Блок А.А. Письма Александра Блока к родным. Т. 2 [M]. Москва-Ленинград: Academia, 1932.
- [6] Блок А.А.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8 томах. Т. 6 [M]. Москва, Ленинград: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62.
- [7] Блок А.А.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8 томах. Т.8 [M]. Москва, Ленинград: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63.
- [8] Блок А.А.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5 [M]. Москва, Ленинград: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62.
- [9] Блок А.А.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7 [M]. Москва, Ленинград: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63.
- [10] Богомолов Н.А. Михаил Кузьмин[M]. Москва: Н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1998.
- [11] Бунин И.А.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3 томах. Т. 8 [M]. Москва: Воскресенье, 2006.
- [12] Великая Октябр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и становление совет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1917-1927. Отв. Ред. М.П. Ким[M].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5.
- [13] Вехи. Из глубины [M]. Москва: Правда, 1991.
- [14] Волошин М.А.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 2 [M]. Москва: Эллис Лак 2000, 2004.
- [15] Волошин М.А.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 6. Кн. 2 [M]. Москва: Эллис Лак 2000, 2008.
- [16] Гиппиус З.Н.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 8 [M]. Москва: Русская книга, 2003.
- [17] Гиппиус З.Н.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 9 [M]. Москва: Русская книга, 2005.
- [18] Горький М.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30 томах. Т. 24 [M]. Москв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53.
- [19] Есенин С.А.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 [M]. Москва: Олма-Пресс, 2006.
- [20] Катанян В.А. Маяковский.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хроника [M]. Москв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56.
- [21] Козловский А. С. А. Есенин 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х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 В 2-х т. Т. 1. [M]. Москва:

-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86.
- [22]Лапшин В.П.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жизнь Москвы и Петрограда в 1917 г. [М]. Москва: Советский художник, 1983.
- [23]Литература русского зарубежья в 6 тт. Т. 1. кн.2. Ред. А. Афанасьев[М]. Москва: Книга, 1990.
- [24]Мандельштам О.Э.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4 томах. Т.1[М]. Москва: Арт-Бизнес-Центр, 1993.
- [25]Манухин И.И.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 1917-1918 гг. [J]. Новый журнал, 1958, Кн. 44.
- [26]Немирович-Данченко В.И. Статьи. Речи. Беседы. Письма [М]. Москва: Искусство, 1952.
- [27]Нестеров М.В. «Христиане» — «Душа народа». 1917. О пережитом. 1862-1917 гг.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web]. [https://design.wikireading.ru/8705]
- [28]Репин И.Е. Письма к писателям и литературным деятелям. 1880–1929 [М]. Москва: Искусство, 1950.
- [29]Родченко А.М. Опыты для будущего [М]. Москва: Грант, 1996.
- [30]Рождественский В.А. Страницы жизни[М]. Москва-Ленинград: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1962.
- [31]Розанов В.В. Религия. Философия. Культура[М]. Москва: Республика, 1992.
- [32]Русская свобода: еженедельник[J]. 1917(1).
- [33]Станкевич В.Б.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М]. Ленинград: Прибой, 1926.
- [34]Устрялов Н.В. Национал-большевизм [М]. Москва: Эксмо, 2003.
- [35]Федин К.А. Писатель, искусство, время [М]. Москва: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1961.
- [36]Ходасевич В.Ф.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4 томах[М]. Москва: Согласие, 1997.
- [37]1917: Частные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а о революции в письмах Луначарского и Мартова. Сост.: Н.С. Антонова, Л.А. Роговая[М]. Москва: АИРО-XXI, 2005.
- [38]李大钊. 李大钊全集第 2 卷[М].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39]列宁. 列宁全集第 28 卷[М].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 [40]张建华. 20 世纪 20 年代苏联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地位[J]. 社会科学，2010(10).
- [41]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上编[М].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

Intelligentsia and Power: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in the Great Russian Revolution

Yang Zheng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150080, China)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society is one of the acute problems at all times, and the relations between power and intellectuals are almost the most difficult and tense. This topic is still relevant nowadays, especially in light of the centena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of 1917. In the Great Russian Revolution of the early 20th-century, artistic intelligentsia had experienced complex mental confusion: from high hopes to strong disappointment. In dealing with the new regime, intellectuals had different views: there were cooperation, compromise, and conflict. In the end under high pressure from the government, some intellectuals were subjected to suppression, some left the Soviet Russia, while others transformed on their own initiative or under duress. This marked the end of the Silver Age of Russian culture.

Key words: the Great Russian revolution;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intelligentsia; power; Silver age

作者简介：杨正(1978—)，文学博士，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系副教授，南京大学俄罗斯学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俄罗斯文学史与文化史。

收稿日期：2017-12-15

[责任编辑：刘 锟]